

H. N. BRAILSFORD 著

胡慶育譯

蘇俄政治之現況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蘇俄政治之現況

「六四」付印
「六五」出版

H. N. BRA'LFORD著
胡慶育譯

〔全一冊定價大洋一元 郵資一角〕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太平洋書店出版發行

上海牯嶺路餘慶里一弄

太平洋印刷公司代印

總發行所

上海太平洋書店

處售分

長沙武昌各埠
南昌天津各埠
太泰東平太華書局
大洋洋書局

電話 中央 九六七五

蘇俄政治之現況

譯者序

—

純客觀的事實的紀述不是歷史；而只是史料【註一】我們在讀歷史的時候，只可希望要讀活潑潑的客觀的歷史；而不可希望要讀死板板的純客觀的史料。假如我們把一切的客觀的歷史都看成是純客觀的史料，則學問界裏便不應該再留有歷史家的地位，因為各個小心的有經驗的錄事先生便都馬上變成歷史家了。我希望讀者拏這個態度來讀這本書，然後他才能理解這本書到底是客觀的還是非客觀的；然後某本書是客觀的還是非客觀的這個問題才有討論的價值。

【註一】我記得這是李守常先生的話，請參看他所註的史學要論（商務）。

譯者序

賴斯基 Laski 在他所著的《共產主義 Communism》的緒言上面說：「我這本書是摹客觀的態度寫的；但是在撰作這一類的著作的時候，所謂客觀態度也者，也只可適用到相當程度而已」【註一】摹上段所闡發的態度看來，他便無異在說：他只打算寫一部客觀的歷史；而不打算寫一部純客觀的史料。固然，他所說的只限於他這一類的著作而已；但是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這部書是不是也屬於這一類呢？不用說，自然是「是的」。那末，他所說的話是不是也可以同樣地適用在這本書上面呢？自然也是「是的」。我希望讀者在應用第一段的原則來估計這本書的價值的時候——或者是在把這個抽象的原則應用到一切的具體的歷史的觀照的時候，不要忘了這一點。

【註一】 從記憶中追擇出來，與原文當有出入。

史料和歷史的分別既如上述了；但是客觀的歷史和非客觀的歷史的分別又在什麼地方呢？據我看來，客觀的歷史的構成原素有二：第一，棄去了私人的固有立場；第二，杜絕了惡意的宣傳作用。什麼是私人的固有立場呢？從橫的方面說，牠便是國籍的立場和地域的

立場；從直的方面說，牠便是時代的立場。站在現代的立場來批評滿清季世的康長素是犯了後者的不謹；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來批評日本，或是站在山東人的立場來批評廣東便犯了前者的不謹。各個作家都是有他的固有的時代，固有的國籍，和固有的籍貫的，所以便有所謂作家的私人的固有立場。什麼是惡意的宣傳呢？假如我信三民主義，我便說三民主義的信徒所要說的話；我信國家主義，我便說國家主義的信徒所要說的話，這只能算是宣傳；而不能算是惡意的宣傳。我這裏所謂「惡意」也者，乃是「明知故犯的」而言。（昭這樣解釋，「惡意」便成為一個法律上的術語，現在爲了行文之便，勉強借用在這兒。）顧孟餘先生說：在我們說話和聽人家說話的時候，我們必須曉得所謂有「策略的宣傳」和「正確的理論」之別。他那裏所謂「策略的宣傳」便是我這裏所謂惡意的宣傳，因此，在實現的生活方面，惡意的宣傳並不能算是一種壞的東西；但是在學問的探討方面，牠可就不是這樣了——換句話說，牠乃是客觀態度的敵人。至於善意的宣傳，則我以爲是無傷於客觀的態度的。假如我們連牠也認爲是客觀態度的敵人，則是無異於不准人發揮己見；或

至少也是不準一般思想有了重心的人發揮己見，那末，我們又只可回向死板板的史料裏面尋求客觀主義去了。

閒話說得不少，我們現在再歸入本題。擎上述的種種條件當作衡量的器具，來批評我們這本書。

現在先說作者的私人的固有立場。在這方面，第一，我們要問問作者的出生和習處的國度和俄國有沒有什麼大的差別呢？他有沒有站在他本國的立場來批評俄國呢？倪林教授 Scott Nearing 說：英國是斯賓塞 Spencer 的；德國是馬克斯的——換句話說便是英國是個人主義的；德國是社會主義的【註一】。這乃是倪林心目中的英德的差點；而我則以為與其說這是英德的差點，毋寧說是英俄的差點之更為切當。戴季陶先生說：希爾斯威克主義乃是馬克斯主義和蒙古式的軍國主義的聯合產品【註二】。按照這樣解釋，則俄國之反個人主義的色彩更覺得鮮明了。我們現在逼進一層來問：本書的作者有沒有站在個人主義的立場來批評俄國呢？他批評俄國的獨裁制說：只有俄國才會有這樣的一個制度；至

於英國人呢，則雖是在一般勞働者當中，也是不能忍受這種制度的。他們的對於未來的希望儘管是憧憬着馬克斯所想像的社會主義的來臨；但是他們的潛意識却認定了個人的地位是件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唯然，所以他們便抱殘守闕地死守着議會 Parliament；而謝絕了蘇維埃。從此可見作者對於上述的英俄的差點是已感覺到的了；但是他是不是因此而把蘇俄的獨裁制罵得一文不值呢？不，根據蘇俄的現在的情形和歷史的背景，他反說這是必須的。第二：我們要問：作者所處的時代是不是和俄國的一樣？他有沒有站在他自己時代的立場來批評俄國呢？驟然聽來，第一個問題似乎是很滑稽，因為作者在本書裏所批評的俄國并不是史乘中所描寫的古代的俄國，而是他親眼所觀察過的和他同時并存的現代的俄國；但是稍加思索，可就不是這樣。按時代的劃分方法普通共有三種：一在哲學方面，我們有神學時代，哲學時代，和科學時代；二在歷史方面，我們有上古時代，中古時代，近古時代，和現代；三，在經濟方面，我們有漁獵時代，游牧時代，農業時代，手工業時代，和工業時代。從第一二兩方面說，英俄兩國固然是站在同一的時代裏面；但是從第三方面說，則英

國家已進至工業時代；而俄國則至多也不過是拼命地往這個時代裏鑽【註三】而已。去年我碰着一個新從莫斯科來華的美國人。我問他說：俄國的現情有什嗎進步嗎？他搖首答道：貧困得很——“Poverty”這便是一般工業時代的人們對於半工半農的國度的慣評。但是作者是不是也抱着這樣的態度呢？不，他只會舉一九二〇年的俄國和一九二七年的俄國相比；而不會拿英國來和俄國相比。所以別的英美的觀察者只能從俄國裏看見了「貧困」；而他却看見了「興盛」；看見了「進步」。倪林說：「在歐戰後的經濟的善後方面，世界上沒有一國趕得上俄國那樣地快」【註四】他和作者的論調都是一樣的；但是他却是從統計方面看出來的，作者是從直覺方面觀察出來的。

【註一】 見 Scott Nearing, Riches and poverty 第一章。

【註二】 見歲季兩年之路兩個方程式節。（民智）

【註三】 見 Scott Nearing,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P.

【註四】ibid. P. 138

現在我們再來攷察作者在政治方面的個人的信仰。從本書的字裏行間，我們固然可以探到相當的片段的消息；但是這是不夠的。我們當更進而考察他的黨籍。關於這方面，本書的作者傳略雖然是寥寥數行，但若仔細尋覓，則牠所給我們的暗示正復不少。現在我們且把他歷年所會發生過關係的報紙列在下面，然後再將各報所代表的黨分析下來，則作者的黨籍也就不難推知：

年度	報紙的名稱	所代表的政黨
一八九七左右	曼撒斯特防衛報	進步自由黨 Advanced Liberal
一八九七左右	每日新聞報	自由黨
一八九七年以後	英倫國家報	獨立自由黨
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六	新導報	工黨(獨立勞動黨) Independent Labor party
一九二八【註二】	"	"
	"	"

〔註一〕 見 Political Hand book of the world P. 27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nd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8)

從此我們可以得到兩個結論：一、作者是由自由黨轉入工黨的；二、當作者撰作本書的時候，他是個工黨黨員。

我們現在再看看英工黨對於共產黨的態度是怎樣？英工黨首領對於蘇維埃制的批評又是怎樣？關於這二者，我們不能在這兒詳論，只得舉出一兩件彰明較著的事實，藉以形成一種很粗率很簡略的概念罷了。

關於第一方面，我只可以舉出下列的兩件事實：第一，在一九二四年頭九個月當中，英工黨首領麥克唐奴組成工黨的內閣。在這期間內，他雖然承認了蘇俄政府——一九二四年二月一日承認——但是關於和議的進行方面，他却和共和黨的魯意喬治內閣以及保守黨的鮑爾特溫內閣沒有什麼分別。他也是和他們一樣地首先提出了「承認舊債」的問題，英俄交涉因此便形擱淺。在這方面，晏撒斯特防衛報批評他道：原來工黨內閣也和其

他資本家的內閣一般拚命地爲內國的銀行家和投資家作保障【註一】英工黨的對俄的外交政策，從此可見一斑。第二，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四日，英工黨頒布了一道通告：將黨裏的共產份子掃數開除。這乃是全體黨員投票公決的【註二】英工黨對待共產黨的態度，從此又可見一斑。

【註一】見 R. Page Arnott, Soviet Russia and her Neighbour, P. 747 (N.Y.

Vanguard Press, 1927)

【註二】見 Robert Hunt Lyman, 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for

1928, P. 556-557 (The New York world.)

關於第二方面，我只願意引錄兩段麥克唐奴的話，以資印證：第一，關於蘇俄的獨裁制，他批評道：俄羅斯式的獨裁制的自然結果無他，只是過份地處罰牠的反對派，養成好武的精神，箝制少數派的思想自由，助長腐化風氣；致令有本領而復具有服務熱心的人們不能得到工作；阻止眞的德模克拉西政制的實現【註一】第二，關於蘇維埃制和議會制的比較，

他說蘇維埃政制乃是一種方尖式的政制【註一】牠以地方政府爲直接民選的根基；而在這些地方政府之上的却只有一個中央執行委員會。至於議會制呢，則牠確是以直接的輿論爲根基，而根據這個根基以指導一切地方行政的【註二】麥唐努乃是英工黨的代表人物，從此英工黨首領對於蘇俄的態度又可窺見一斑。

【註一】 見 R. Macdonald, *Dictatorship and Revolution*, P. 43。

【註二】 方尖碑下大上小，喻政權由少數人把持之意。

【註三】 見 R. Macdonald, *Parliament and Revolution*, P. 31。

從上述的種種，我們可以得到兩個結論：一、英工黨對於蘇俄略懷仇視——或至少也沒好感；二、在理論上，英工黨的首領否定蘇維埃制。但是本書的作者是不是也根據這種的理論來批評蘇俄呢？不在原則上，他雖然是這樣地信；但是他可未曾把這些理論認爲是「放之四海而準」的金科玉律。在本書裏，他老實不客氣地自供道：「我們乃是別個政制——按指德模克拉西政制——的維護者；」但是他並不因爲他自身維護這個政制，而把

蘇維埃制罵得一文不值。他說：蘇維埃制只看見了片面的區域，而沒有看見了整個的國家——尤其沒有看見整個的世界。這是他對於蘇維埃制最嚴刻的詬謗；但是他却不會因此而把牠的其他的優點一概抹殺。觀乎這些一切，我們亦大可以深信作者的客觀態度「業已用至相當的程度」——至少也「業已用至相當的程度」了罷！

我之所以要費了半天氣力來說明這點的原故不是要來提高作者的身價——更精確一點說，作者的「作者身份」*Authorship*——而只是要讀者明白：這本書乃是一部比較地可靠的信史：一方面不是共產黨的自述；他方面也不是帝國主義者的對於他們的反宣傳。

至於關於蘇維埃制的批評，則還是各有各的，作者的見解也不過足資參考而已。

二

本書的譯例也一并附錄在下面：

一、本書原名 *How the Soviets work*，直譯應爲蘇維埃怎樣地工作？現以牠未能充份地代表本書的內容——這層作者在他的序文裏面業已提及——改稱今名。

二、本書的逐譯以直譯爲原則，以意譯爲例外。

三、本書遇有詞意晦澀——或是譯筆晦澀——之處，以及搖指已往史實，因而致令普通讀者不易了解之處，概爲註出。

四、作者原註概爲譯出，隻字未刪。并爲防止致與譯者的附註混淆起見，特在每註末尾標明「作者原註」字樣；無這字樣的便是我的附註，當中倘有錯誤，應由我單獨負責。

五、我現在旅次，攜書無多，「附註」出處，因之未能一一標明，很爲抱歉。

六、卷首的詩句和篇末的附錄都是由我附加的，也是由我自譯的。
最後書中倘有謬誤，敬求讀者不吝指教，俾在修版的時候有所遵循。

譯者一九二八，一二一八，上海

王格爾德蘇俄研究叢書總序

俄國革命將我們這飽受戰爭流毒的世界給唬毀了；將在這二十世紀當中的一個很冒險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大試驗給開始實行了。牠所直接影響到的區域非常廣袤；牠所創始的轉變非常激烈；而牠對於全世界的國際關係的已往的和未來的影響則更不可衡量。單就這方面看來，我們已經可以說牠——無論是好是壞——總算是近世史內最偉大的一件史績。好些的美國人都在忘記：在列寧和他的共產黨徒奪得政權之後，我們又度過了十年很急激的革命的改弦更張期業已過去。現在蘇俄所正在慘淡經營的便是要來一步一步按步就班地建設一些事業——一些和我們的完全不同的事業，一些很奇特的事業，一些前程杳茫不可預測的事業。

自從建國以來，我們美國便是一個諸多發現的場所。不只在科學的範疇內，我們有我們的發明；即北極和那素無人知的新大陸也是我們發現的。在這方面，我們實在犧牲過不

少的生命，不少的金錢。但是到了今日，我們對於那個面積約佔全世界總面積六分之一的大國却不能有相當的了解，却只是一味懵然。我們和蘇俄只隔着一個大西洋；而我們對於她的偏見誤解，以及胡亂的宣傳却和這個大西洋等其深。我們對於蘇俄還是如同政府設法防疫一般遇事諸多窒塞。這樣帶來的結果無它只是糊塗，只是無知。即我們的最高的政府人員之一對於這種糊塗，這種無知，也曾老實不客氣地公開承認。格利推事 Judge Gray 在他的判詞上說：「對於一切的蘇俄的現存情形，我也是和其它的美國人並無兩樣地什麼也不懂。」

每個科學家都相信：「糊塗」是世界上的最危險的勢力之一。所以我們對於蘇俄——無論她的制度是怎樣地壞，或是怎樣地好——我們總要知個究竟。我們現在所能聽到的只是一些道聽塗說的消息，和羌無實據的宣傳。

在已往的十年當中，蘇俄政府業經飽受揶揄，飽受離間；甚而至於有些媚於詞令的演講家們竟想以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的方法，用幾句動人聽聞的言詞，便把蘇俄給很輕倩

地帶到棺材裏去。但就事實觀察起來，則蘇俄並不因此而中夭；反更能蒸蒸日上地進入富強之域。她的國勢較之以往還強；她的領袖的指導任期較之世界上任何國家的內閣都久遠。現在我們用科學的方法和無偏無黨的精神來考究蘇俄的時期業已成熟了！我們對她摒棄一切恣口漫罵的言詞根本動搖的輕信的時期業已成熟了！現在蘇俄成立業已十年，而我們對她還是不能得有什麼真的發現。我們深信世界上的人類們絕不會永遠地這樣糊塗的。

無論我們把共產黨看做社會的公敵，或是人羣的救主，在我們對於他們未下判語之前，我們總得把一般和他們有關係的事實考究一下。無論我們對於他們的判語是怎樣，我們總得承認：他們正在從事於一個新的政治統御工具的創製。他們的這種的創製的試驗應該受有科學方法的考察，而不應受有含有敵意的軍隊的光臨；應該受有帶有理性的批評，而不應受有無理取鬧的謾罵。

在已往的時候，我們國裏充滿了種種關於蘇俄的風傳，所以羅斯博士 F. E. A.